

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考

□ 黎昭董

随着2015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将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健全农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监督和收益分配制度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不仅能够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而且可以盘活农村闲置用地等集体资源和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进而为推动乡村产业融合提供动力。基于此,笔者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改革历程及改革成效进行探索,以期为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有益思考。

一、改革历程:从探索试点到全面推进

改革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便开启了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之路。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就我国应如何构造农村产权制度进行讨论,提出明确农村合作经济制度是适合当前我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微观经济组织制度,农村产权制度的重构需符合效率和共同富裕的双重标准。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内部产权关系不明,职能定位不清等问题逐渐阻碍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在农村经济中逐渐滞后于其他经济成分。

改革探索阶段。2014年,《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明确提出要对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

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该方案正式拉开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序幕。

改革推进阶段。从2015年开始,原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开展了四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有序开展诸如集体成员身份确认、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等一系列工作。截至2021年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此次改革不仅全面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和产权明晰,更为激活农村要素市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改革成效:激发产业融合新活力

一般而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明晰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关系,这为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以及集体经济行为能力重构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

农村集体产权关系的明确界定能够赋予农业劳动者更多有关集体资产的知情权、参与权,弱化农户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所有者角色,强化其作为集体资源要素所有者和要素贡献者的角色,使农业劳动者从农村固有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激发农业劳动者利用集体资产发展相关产

业的内在动力,从而赋予农业产业新功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实现农业多功能拓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助于土地产权制度的明晰,改善土地错配程度与农业细碎化程度,进而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并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这不仅有助于破除农业劳动者与土地之间的双向依附关系,释放更多劳动力从事农村第二、三产业,从而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还能促进信息、资金与技术等资源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优化共享,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动力和要素支持。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对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折股量化,以此明确集体经济组织产权行为能力,促进集体经济组织的对外合作与内生发展,使其成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体。在此背景下,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盘活闲置的房屋、土地进行招商引资,同时,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等,以此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等新业态,实现就业岗位增加、提升农村集体创富能力以及增强集体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与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从而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

三、深化路径:释放改革红利

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推动乡村产业

融合发展。地方政府需要赋予村集体更多的自主权以激发集体成员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体意识,鼓励创新多种集体经济发展形式并充分挖掘乡村特色资源,改变农村单一的产业模式,进而推动乡村产业融合。

政府需要加强各项政策的协同性,强化“三块地”改革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联动效应。通过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并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逐步释放改革红利,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并激发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政府应通过建立跨区域的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平台,促进地区间的资源共享以及经验借鉴,同时加大对乡村交通和通信设施的投入,为推动乡村产业融合提供基础保障。

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产权流转的方式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以及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从而扩大县域市场规模。同时,通过政府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手段,鼓励乡村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民族文化赋能文旅品牌建设的实践途径

□ 方 婕 尹彦娥

正版文旅创意产品的市场。

二、民族文化赋能文旅创意产品开发的实践路径

挖掘精神内核,强化地方特色是提升文旅创意产品辨识度的关键路径。深挖这些文化宝藏,不能仅停留在收集民族服饰、建筑工艺等显性符号上,更要挖掘其精神内核。可对民族服饰纹样、建筑榫卯结构等显性符号进行谱系化梳理,结合地方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访谈,提炼背后的精神内核,如苗族银饰的“图腾崇拜”、侗族鼓楼的“社群凝聚”理念,形成“符号—内涵—价值”三层解释体系。例如,云南大理白族“风花雪月”,以“守护大理”叙事传递“人与自然共生”理念,将文化基因注入文创产品创作,让文创产品既“形具特色”又“魂含底蕴”,形成“见文创产品知文化”的强辨识度,使文旅创意产品在彰显地方特色的同时,也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还可以跳出纹样复制的浅层设计,将民族精神融入现代载体,如基于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迁徙智慧,设计可折叠便携的旅游主题露营装备,附带文化手册解读其顺应自然的生存哲学,让产品成为体现民族精神内核的传播媒介。

创新开发模式是打造特色文旅创意产品的关键抓手。鼓励文旅企业深度结合民族文化特质,突破传统舞台表演、村落参观等单一形式,通过引入沉浸式体验、互动参与等项目等,拓宽民族文化与现代创意的融合路径。例如,《我的阿勒泰》助力新疆旅游的案例,生动诠释了优质影视作品与文

旅深度融合的潜力,也精准呼应了当下“为景赴城”“为味赴景”的体验式消费趋势,向“深度体验品质生活”的需求升级。可开发“时空折叠”沉浸式剧场,以民族史诗为蓝本,在村落实景中搭建互动剧场,游客通过佩戴智能手环选择角色(如扮演侗族大歌的传歌人等),随剧情参与技艺传承等关键场景,借助新技术叠加历史场景重现,让游客在演绎中理解文化传承逻辑。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推进文创产品跨界联动,空间跨界打破地域与媒介壁垒,让文化元素渗透多元场景;行业跨界推动文旅创意产品向餐饮、住宿等领域延伸;科技跨界借力数字化设计、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重构体验场景。多元跨界实践能为民族文化与文旅创意产品开发注入持续动能。

完善民族文化保护体系是文旅创意产品规范运行的关键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要素支撑,建立文旅资源授权系统,需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为基石。因此,要文旅知识产权的授权环节真正规范有效,首先得把知识产权保护“地基”打牢。倘若缺乏对民族文化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授权系统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应优先深化知识产权专项立法,重点聚焦民族传统文化领域,明确界定民俗传统、历史遗迹等资源的保护标准与责任主体。保障其仪式流程、核心环节的原真性;对于自然景观类知识产权,需通过立法划定合理开发边界,配套严格的保护措施,防止过度商业化对其生态与文化价值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唯有通过立法构建清晰的权利边界与保护规

则,才能为文旅知识产权授权系统的规范运行提供坚实保障。具体来说,可建立知识产权确权登记系统,搭建“民族文化知识产权数字备案平台”,非遗传承人、村寨集体可上传文化资源,经专家评审后获得唯一数字确权标识,作为授权、维权的法律依据,防止侵权盗用。

以品牌为核心的精准运营是文旅创意产品有效传播的关键依托。增强情感共鸣、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是文旅创意产品传播的核心关键,品牌则是串联二者的重要纽带。民族文化承载的精神信仰等能唤醒情感共鸣,当游客参与蒙古族那达慕大会时,在赛马的疾驰与摔跤的豪情中感受对勇敢与力量的崇尚,便与其建立起情感联结,这种联结若能被品牌有效捕捉并放大,便能深化大众对文化的记忆点与认同感。在品牌打造中融入更多文化内涵,本质上是向品牌注入独特灵魂,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品牌运营,需精准洞察细分市场特点,为年轻群体打造潮流打卡点、为家庭群体设计亲子文化课,为中老年群体安排康养项目,这样既满足不同群体需求,又强化情感联结,构建文旅新品牌。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向印度洋的大通道建设》(项目编号:2023CX03)阶段性成果、2024年云南省社科院院级课题《数字技术视域下云南文旅IP跨界模式的孵化研究》(项目编号:YB202410)阶段性成果。)

把握红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的四个着力点

□ 周明星

红色物质文化资源承载着厚重的民族精神,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从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的历史物件展示,到六安“双核心、七大区域”的教育网格体系,从虚拟现实技术(VR)打造的沉浸体验馆,到“云展览”平台的线上传播,红色资源正通过教育基地建设、文旅融合发展、研学实践创新、数字技术赋能等多路径,实现从静态保存到动态传承的跨越。挖掘好、利用好这些资源,既是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繁荣文化事业、激活时代价值的关键之举。

一、打造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红色物质文化资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及革命传统教育提供关键支撑。可通过构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重点利用其红色革命遗迹、烈士纪念馆与红色纪念碑等资源。以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为代表的13处国家级红色旅游目的地,如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采用历史物件展示、多媒体互动及现场解说等手段,全面再现革命时期的场景。例如,安徽省六安市集合了34个党性教育实地学习基地,形成了以“双核心、七大区域”为架构的教育网格体系,推出了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十二)》等专题课程,并利用虚拟现实技术(VR)创作了《薪火相传》沉浸体验馆,实现了红色教育文化的直观传达。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通

过数字化修复“穿石庙会议桌”等革命文物,并整合《红六安》等逾50部党史研究著作,构建了融合实物展示与理论解析的历史教育体系。同时,通过与地方党校、高校展开合作,将基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平台,常态化开展“红色文化日”等仪式活动,强化公众的情感共鸣。

二、红色文化旅游与多元业态的融合路径

红色文化旅游是连接文化遗产与群众间的桥梁,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正逐步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及文化繁荣的核心动力。例如,鄂、豫、皖三省共同启动并推广了一系列整合“红色”与“绿色”旅游资源的创新模式,包括“红色+生态”“红色+民宿”及“红色+乡村建设”等策略,旨在构建多元化的“红绿古”旅游体验。湖北黄冈市策划了以“千里跃进大别山”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该线路串联了红安的革命历史遗迹和麻城的烈士纪念馆,强化了红色文化与自然景观的融合。金寨县则开发了六条精品旅游路线,通过结合“中国红岭公路”等项目,巧妙融入了天一堂的自然风光与红军的军事遗址,实现了自然美与红色文化的和谐共生。与此同时,文创开发与产业链拓展成为增强红色文化旅游价值的关键途径。例如,以“大别山精神”核心的主题盲盒及革命歌曲明信片等文创产品,与地方品牌如“新县红”及

“金寨中国红岭公路”相呼应,共同激发市场活力。黄冈市则探索“红色文化与茶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构建油茶产业园区与茶文化走廊,旨在将红色文化的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

三、推动红色文化与研学实践相融合

红色物质文化资源的教育功能还体现在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研学实践。以大别山为例,近年来该地区已建立起以实践、体验与传承为核心要素的研学教育体系。针对课程开发与校地合作,六安市实施了“红苗工程”。该计划按年龄层次编撰教材,成功培养了“红哥哥”与“红姐姐”等青少年宣传团队。同时,皖西学院与金寨干部学院联合成立“安徽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促进学术研究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与提升。建设体验式实践基地显著增强了研学教育的实际效果。新县构建了中部地区范围内的最大中小学生学习基地,并推出“大别红营”的一日营课程,内容涵盖重访红军行迹、参与农事体验等元素。湖北英山县则启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引航,引入“穿红军服,走红军路,吃红军饭”等沉浸式活动,通过现场解说、角色互动及情景重现等手法,使学生得以亲身体验并深刻了解革命精神。学生通过此类体验不仅认识了红军的艰难行进,更深切体会到革命先辈对国家的贡献。在研学营地中,学生还可以学习

关于历史、自然以及人际交往的重要知识,为今后的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四、借助多媒体技术助力红色文化传播

在数字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推动线上展览以及虚拟参观的发展。例如,六安革命博物馆、金寨县烈士纪念馆及其他相关场所已建立“云展览”平台,使观众得以远程访问展览内容。此平台通过语音导览、视频解说及互动问答等多样化形式,提升观众在线学习体验。推进红色文化短视频的传播发展。多地依靠短视频平台,由青年讲解员、学生及乡村干部组成“红色宣传团”,以地方方言叙述革命事迹,旨在增强传播的亲和力。促进红色文化的数字化创新发展。借助增强现实技术(AR)互动、利用数字地图与电子书等新媒体,开发多样化的红色文化体验产品。如增强现实技术(AR)被应用于展示重要历史遗址中的最大中小学生学习基地,并推出“大别红营”的一日营课程,内容涵盖重访红军行迹、参与农事体验等元素。湖北英山县则启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引航,引入“穿红军服,走红军路,吃红军饭”等沉浸式活动,通过现场解说、角色互动及情景重现等手法,使学生得以亲身体验并深刻了解革命精神。学生通过此类体验不仅认识了红军的艰难行进,更深切体会到革命先辈对国家的贡献。在研学营地中,学生还可以学习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

革命文物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贵州是红色文化的沃土,革命文物优势突出,有750余处不可移动长征文物,2500多件可移动文物,高等级长征文物数量居全国第一。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为大中小学思政课提供了众多教育素材,要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让革命文物“活起来”,把思政课的道理讲深、讲透、讲活。

一、实践进阶:以革命文物为载体的分层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构建革命文化特色教育链条。革命文物兼具“红色”和“文物”的双重属性,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中引入革命文物,学生可以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斗争精神,感受革命先烈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无畏勇气。如遵义会议会址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实物见证,让学生感悟革命精神内涵。娄山关战役遗址的弹壳、荷坝会议使用的马灯等实物,让学生直观感受“四渡赤水”的军事智慧与“一盏马灯”照亮红军征途的军民鱼水深情。通过革命文物深化对革命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将中华民族的红色基因印记铭刻心间。

促进学段衔接,构建革命文物育人体系。在小学阶段,组织学生参观贵阳明德学校旧址,聆听王若飞的少年故事,通过生动的故事和图画,让学生初步了解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在中学阶段,开展“重走长征路”研学活动,感悟“红色贵州一雄关漫漫”,通过深入的讲解和讨论,让学生思考革命精神的现实意义。在大学阶段,依托革命纪念馆的数字资源,开展“革命文物修复与历史研究”创新实践项目,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和践行革命精神。通过红色历史教育的层层深入,助力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二、原则遵循:革命文物赋能思政课的实践准则

提升教学实效,强化革命文物价值引领。通过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和精神内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贵州是红军长征期间活动时间最长、活动区域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重要革命遗址遍布全省各地。如黎平会议会址,黎平会议开启了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序幕,孕育了“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黎平会议精神。长征途中留下的革命文物“红军连长陈树容购猪兑换条”感悟黔北人民对红军的拥护爱戴之情是多么热烈而诚挚。从革命文物中汲取精神力量,有效提升思政课的教学实效,让学生理解革命文物的历史价值,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坚持守正创新,历史性与现实性相互贯通。在革命文物赋能思政课的过程中,既要坚守革命文物的本质和价值,又要不断创新教育方式和手段,使其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教育需求。守正,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准确传达革命文物的历史信息和精神内涵;创新,就是要根据新时代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让革命文物教育更加生动有效。如开发“数字革命文物”APP,整合全省革命遗址的VR全景、文物故事音频和视频,利用AI技术复原“红军在贵州”的各种场景。通过创新实践使革命文物在思政课中的教育作用得到最大化地发挥。

三、创新路径:革命文物融入各学段教育的特色实践

小学阶段的革命文物趣味教育。针对小学生认知特点,以“故事化、体验化”的方式呈现贵州革命文物,引导学生初步了解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如可以通过绘本、动画、故事会等形式,向学生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革命精神,在字里行间感受革命先烈的勇敢和坚韧。通过参观革命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可以亲眼看到革命文物,增强对革命历史的直观感受。

中学阶段的革命文物深度解读。在中学阶段的授课过程中,可结合贵州革命文物开展议题式教学,以“遵义会议为什么是伟大转折”为议题,展示会议记录手稿、参会人员用过的物品等文物图片与视频;围绕“四渡赤水的军事智慧”来分析革命文物背后的战术逻辑,帮助学生理解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和革命精神的深刻性。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革命精神的力量,深化对革命精神的理解和认同。

大学阶段的革命文物研究与实践。依托贵州革命文物资源,构建“理论—研究—实践”育人体系。如大学在思政课上专题研讨“黔北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支持学生团队开展“革命文物数字化”科研项目。也可以推动跨学段联动,组织中小学与大学联合开展“革命文物讲解员”培训,让大学生带领小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形成“大学引导、中学深化、小学启蒙”的协同育人模式。

革命文物作为思政课的活教材,其蕴含的精神力量与教育价值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中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分层实践、原则引领与创新路径,让贵州革命文物从历史中“走出来”,融入课堂、走进生活,不仅能赓续红色血脉,更能引导学生在理解革命历史的过程中,树立远大理想,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临沂大学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革命文物活化与沂蒙精神传承创新研究》(项目编号LUHX2024127)、临沂市社会科学界研究课题《沂蒙革命文物与学校思政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25LX14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发挥革命文物在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以贵州革命文物资源为例

□ 尚金章 赵亚迪 王磊